

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发挥民营经济活力

□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赵白执南

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专题研讨会16日在京召开。与会专家表示,未来中国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,需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,激发企业活力,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,发挥人才红利,推进改革进一步深化。



周延礼: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有利因素较多



□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

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、副主席周延礼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表示,未来一段时间,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有利因素仍然较多。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下,要把握好稳增长、调结构、防风险之间的平衡。对宏观杠杆率较高的三大主体,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。另外,需坚定做好结构性去杠杆工作,把握好力度和节奏,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

周延礼表示,服务实体经济、防控金融风险、深化金融改革是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务,而防治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。去年以来,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。今年一季度以来,去杠杆初见成效,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。

周延礼表示,需认清三大加杠杆的主体。一是地方政府,地方政府2008年后债务规模攀升,显性债务整体可控,隐性债务风险较高。二是国有企业,国有企业盲目加杠杆使得宏观杠杆率攀升。三是房地产部门,房地产价格、贷款和投资在2008年后经历了三轮较大周期,逐步推高相关行业杠杆率。

对于宏观杠杆率背后的深层次机制,周延礼称,一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;二是三大加杠杆主体背后的深层次机制;三是间接融资为主、市场分割严重的金融格局是高杠杆的结构性原因。

对于当前的去杠杆进程,周延礼认为,目前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,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回落;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速率边际放缓,住户部门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范文仲:监管规则会更透明更友好



□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范文仲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表示,扩大金融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中国的监管规则会变得更透明、更友好,为外资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空间。近期正在修改关于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的管理条例,希望尽快能推动一些设想落地。

“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,很多指标排在了全球前列。”范文仲表示,当前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达260万亿元,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业;按照保费规模来看,中国保险业居世界第二位。范文仲称,中国不仅有大市场,还有非常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,因此当前是扩大金融开放的适宜时刻。扩大金融开放的目的不仅是扩大规模和指标,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。金融的本质功能是分配资源,如果能在更大的经济体系内实现资源调配,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就会提高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更广泛和更专业的参与者。

范文仲强调,扩大金融开放不是由于外部压力,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,当前扩大金融开放不仅有必要性,还具有可行性。“我们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在全球金融体系打造一个互利共赢的格局,通过更有序的资源分配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。”

扩大金融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管理,也不是完全放弃规则。范文仲说,中国金融体系应尽量引清水、引活水,不能引入一些“脏水”。所以,更希望一些资本雄厚、风险管理能力较强、专业水平较高的国际机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。为达到这个目的,还要有准入和业务方面的规则。不过,这个规则是更加公平、内外一致的。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样的体系中开展业务,也需要遵守这样的规则。

对于扩大金融开放的重要领域,范文仲介绍,一是欢迎外资更多地参与中国金融市场,监管部门在很多方面降低了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体系进行投资的限制。二是欢迎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设立机构,以更多的形式参与中国金融市场。三是在业务范围上,希望外资金融机构能进一步扩大,真正发挥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些专业能力,促进整个金融市场活动更有效率、更透明。

外部不确定性增加

“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锐意推进改革、扩大开放,主动融入世界经济,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,中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,未来中国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。

“今天的改革是收益大于成本的,是有强烈需求的。改革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,保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,改革的紧迫性是巨大的机遇,改革的动力越大,克服阻碍的力量更大,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。

“在过去多年中,中国采取了渐进、双轨的改革进程。在这过程中,中国对于老的、大规模的国有产业提供了渐进的支持,以这种方式,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稳定,另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。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。

“在转型的过程中,出现了一些扭曲的现象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。”林毅夫说,中国已经采取了上百个相关举措,以彻底消除这种扭曲,但这也需要时间。即使中国执行所

有计划,新的问题仍然会出现,结构性问题将仍然存在。正因如此,中国必须有这样一种态度,即改革永远在路上。

李伟称,经过40年的努力,中国经济面临的匮乏、贫困、短缺问题,即“有没有”的问题总体上已得到成功解决。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包括,受结构性矛盾的影响,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压力较大;受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,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强;受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,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难度不小。特别是今年以来,各国经济复苏步伐分化,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。

保持民营经济活力

“现在有一个热议的问题,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相互关系。”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,在国有资本较大、民营资本较为薄弱的情况下,应当思考“用活”国有资本,使民营经济保持活力。

樊纲指出,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,对自己的风险负责。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要更多依赖自主创新,而创新具有一定风险,需要企业家的风险精神,需要民营企业承担风险的机制。

樊纲建议,可以继续发展优先股制度,或叫AB股制度,国有资本可以投

资,但不要因为投资而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带到民营企业中去,让民营企业能够保持活力,承担自身风险。

在蔡昉看来,激发企业活力,要减轻企业负担和创业成本。“对大企业、国有企业,我们习惯于放心支持,但是对新兴企业容易担心风险。在转向高质量发展时,需要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,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归根结底是优胜劣汰的结果,是‘创造性的破坏’。如果不肯冒风险,最后的结果是该进来的不能进来,该退出的不能退出,就不能达到效果。”

从产权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,一方面,要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,改革国有资本经营体制。国资委要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充分授权,两家公司要向其出资的企业充分授权,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,拥有完全的国有资本经营权。另一方面,要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。国有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,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。要废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的法律、政策和监管。

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

“当前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时代,是改革开放‘啃硬骨头’的时代。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,加快经济体制改革。”杨伟民认为。

具体而言,杨伟民表示,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八大重点。一是深化市场准入改革,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,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。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,除极少数超大城市、中心城区外,其他城市户籍都应该放开,条件成熟时,逐步实现户籍、居住证、身份证的三证合一。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,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改革,使资金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。四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,降低宏观税负,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

的体制,减少专项转移支付,废止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。五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,减少政府投资比重,减少政府主导的各类产业基金,政府投资集中于公共服务和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六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,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科研人员可以自主决定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。七是深化价格改革,加快开放土地、资金、房地产、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等价格。八是深化上市制度改革,打破行政性垄断,防止市场垄断,对国企、民企、外企要实行同等程度的监管。

对于供给侧改革,蔡昉认为,需改善劳动力供给和配置。目前,还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挖掘出来。同时,劳动力重新配置还能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,是全要

素生产力一个重要源泉。同时,人力资本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当前在教育与培训领域改革空间非常之大。一方面,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相应的发展阶段其实还有差距;另一方面,通过消除教育的不公平性,可以改善教育的质量和数量。也就是说,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实际水平的提高将显著提高人力资本,改善未来的经济增长质量。

此外,从激励人才支持创新的角度,杨伟民表示,应完善科技创新产权制度,允许科研人员拥有其应该拥有的科研成果的产权。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大脑和资本共同创造的,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,资本实际上是依附于科研人员的。这项改革推进下去,创新才能成为驱动发展的主导力量。

专家:政策要更紧密协调

□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

多位专家1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专题研讨会上表示,改革应走出宏观政策选择的逻辑陷阱,放眼长远,宏观政策与结构改革政策要更加紧密协调。

减税仍有空间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认为,从财政角度看,全球都是在减税过程中,我国也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,但是宽松到底是政府花钱,还是用减税方式让企业去花钱,取决于效率和速度。从目前我国动态变化特征来看,现在政府花钱效率很难说比企业高。另外,美国减税以后,法国和英国也在开始减税,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国仍有减税空间。

京东金融副总裁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,以减税来帮助资金更好流入居民和企业,能够更加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,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,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增长。更进一步,税改作为财税改革的重要一环,是长效机制改变,而非短期政策刺激,更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。

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,上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偏紧的。7月政策效果尚未显现,未来在增值税、社保、公积金方面,特别是社保环节仍要降低企业的负担。

政策要更紧密协调

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,不应陷入“宽松还是减税”单边选择的逻辑陷阱当中,应当有整体思维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目标是围绕稳就业,财政政策可以在就业稳定性、平等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

“现在我国就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岗位问题,稳定性、平等性也面临一些问题。”刘尚希指出,缺乏稳定性表现在企业员工流动性较大,“今天招收一拨人,明天走了一大批,后天又得去招人,不停招人、不停培训,提高了企业成本。”他认为,财政政策可以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户的均等化,将城市中的农民工市民化,实现同城待遇等。

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表示,中国目前还在转型过渡时期,市场机制还不是非常充分、完善,不能急功近利进行简单刺激而忽略了配套结构改革的政策,宏观政策与结构改革政策要更加紧密协调。

沈建光表示,今年企业利润下降有很多结构性问题,政策协调很重要,不是宏观政策的宽松就能解决的,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办法。比如国企、民企应当有公平的竞争环境,应当一视同仁。

